

緒論

一

二〇一〇年的夏天，我寄居在英格蘭東部的中世紀小城諾瑞奇（Norwich）。這個夏天的工作之一就是完成這本小書的書稿。八、九月的天氣，台北正值盛暑，這裏因為離北海不遠，大部分的時間卻是又冷又濕，不像生前長居諾瑞奇的旅英德國作家謝柏德（W. G. Sebald）所說的酷熱——謝柏德在《土星之環》（*The Rings of Saturn*）一書開頭所謂的「狗日」（the dog days）。這是我度過的最冷的夏天。兩年前——二〇〇八年——我初訪諾瑞奇，在東英格利亞大學作客，主要就是為了謝柏德。謝柏德於二〇〇一年不幸因車禍在諾瑞奇去世。他長期任教於東英格利亞大學，創辦並主持該校的歐洲文學翻譯中心——現在已易名為英國文學翻譯中心。東英格利亞大學當然還有一個舉世聞名的文學創作課程，為英國文壇培養了許多當代重要作家。我在既定的研究計畫之外，就是希望能多了解翻譯中心——特別是謝柏德——與創作課程的現狀。不過除了那一年九月的一場謝柏德國際研討會之外，校園內並未有任何紀念謝柏德的形式或設施——據說這是謝柏德的遺願。

二〇〇八年的夏天美國剛剛爆發次貸風波，金融危機箭在弦上，英國電視也忙着報導新建房屋滯售的情形。兩年後再訪諾瑞奇，執政了十三年的新工黨下台不久，換上了由保守黨和自由民主黨組成的聯合政府——這兩個政黨一左一右，意識形態扞格不入，有的評論家則以同床異夢視之。金融危機之後，英國的財政惡化與經濟衰退情形要比想像中來得嚴重。諾瑞奇市中心的購物中心、百貨公司及超級市場固然不乏人潮，但在市中心外圍卻也有不少商店與餐廳已經結束營業，而市區內專售平價商品的一鎊商店（Poundland）則生意興隆。這一段時間我去過好幾個濱臨北海的城鎮，每個城鎮幾乎都有這樣的一鎊商店。一葉知秋，年頭不佳，尤其低收入者不得不精打細算，度過難關。

據《觀察家》(*The Observer*)週報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九日的報導，面對龐大的財政赤字，英國財務次長丹尼·亞歷山大(Danny Alexander)已經坦承，在下次大選之前非但減稅無望，勢必還要大量削減公共支出。他隸屬自由民主黨，削減公共支出有違該黨中間偏左的政治立場，因此黨內頗多不滿，他在接受《觀察家》週報的訪談時甚至情急表示，「沒有人會說他們從政是為了削減公共支出的」。英國智庫賦稅研究所(Institute of Fiscal Studies)就批評指出，大量削減公共支出將造成貧者愈貧，弱勢者勢將受害(Asthanna and Helm 2010: 8-9)。英國的情形不是特例，只能說是過去兩年來國際金融危機與經濟衰退現象的冰山一角。這樣的社會安全危機正是跨國資本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經濟所帶來的惡果。

經濟不振，失業率高，在束手無策之餘，有些人就開始尋找代罪羔羊，首當其衝的就是各國的外籍勞工與移民。這一陣子歐美好幾個國家都發生過歧視或迫害移民的事件。八月間，法國總統薩科奇(Nicolas Sarkozy)——本人是匈牙利移民之子——下令驅逐法國境內羅姆人(the Roma，俗稱吉普賽人)的消息成為英國主要報紙報導和評論的焦點。據估計，法國境內約有一萬五千位羅姆人，光在今年八月，薩科奇政府就驅逐了約一千位，去年一整年則至少有一萬一千位。薩科奇極端的排外行動受到羅馬教皇的批評，法國天主教若干主教更是對他嚴加譴責，歐盟官方甚至介入調查。《獨立報》(*The Independent*)還特地就此事件與晚近各國反移民的現象在八月二十二日發表社論指出：

特別在經濟緊張的時候，移民經常發現自己變成了代罪羔羊。在這方面法國絕不孤單。義大利政府騷擾與驅逐其羅姆人移民已經好幾年了。而美國正為亞利桑納州政府所通過的一條法律進行激烈的法律戰，這條法律規定，為偵察來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警方有權要求任何人出示身分證明。反對者認為這樣會導致種族歧視。對美國非法移民子女的普遍關心也引發共和黨圈內若干討論，有人建議應該廢止憲法條款中賦予在美國領土出生者公民權的規定。在此同時，澳洲大選的兩位候選人，總理吉拉德(Julia Gillard)與反對黨自由黨的阿伯特

(Tony Abbott) 則陷入誰能採取較嚴厲的手段對付「船民」的競賽中揪鬥不已。「船民」指那些乘船來到澳洲海岸的絕望的政治避難者。

(Editorial 2010: 2)

最諷刺的是，像薩科奇一樣，澳洲大選的兩位主要政黨候選人都不在澳洲出生，都是來自英國的移民——吉拉德出生於威爾斯，阿伯特則在倫敦出生。其實除了原住民，現在的澳洲人——跟台灣的住民一樣——不都是移民的後代？《獨立報》的社論來不及提到的是，八月二十八日在英國的布列福德 (Bradford)，數百位英國國家黨 (British Nationalist Party) 與英國防衛聯盟 (English Defence League) 等極右翼組織的成員與支持者，在市中心舉行反伊斯蘭教示威，與警方爆發衝突。同一天，美國具有濃厚種族主義色彩的右翼組織茶黨也在華府林肯紀念碑前集會——四十七年前的這一天，金恩 (Martin Luther King, Jr.) 牧師就在這裡發表「我有一個夢想」的著名演講 (*Observer*, 29 August 2010, 1, 6)。

這些事件說明了許多人仍然固執偏見，懷念那個已經消逝的基督徒白人仍是歷史主體、仍然宰制世界的時代，不肯也不願面對一個早已改變的世界。用卡普辛斯基 (Ryszard Kapuściński) 的話說，這些人對待他者就像對待陌生人一樣，視之為「某個不同物種的代表，……把他當作某種威脅」(Kapuściński 2008: 58)。因此他們要驅逐他，羞辱他，防堵他的到來。政治人物之所以敢於提出含有種族歧視的政策，因為他們深信，這些政策背後仍有一群同情者或支持者，他們估算過可能的政治效應，包括可能換取的選票。如果我們相信每個人都有「追求幸福的自由」，反移民的立法和行為顯然有違這樣的信念，顯然不符人道關懷，政治人物敢於執意為之，因為他們清楚社會的政治氛圍。反移民所具現的排外恐懼症也告訴我們，法西斯主義的陰魂仍然潛伏在某些人心中，並未形消於無。歷史血淚斑斑，殷鑑不遠，許多思想家因此憂心忡忡，紛紛以各種論述嘗試打開困境。早在一九八〇與九〇年代，克莉絲蒂娃 (Julia Kristeva) 就一再析論陌生人的角色；德希達 (Jacques Derrida) 也反覆討論如何待客，如何悅納異己；列維納斯 (Emmanuel Lévinas) 則以倫理學為其哲學重心，暢論自我對他者的責任；哈貝

瑪斯 (Jürgen Habermas) 更主張要包容他者。這些論述或思想之出現並非偶然，其背後應該有相當實際的現實基礎與倫理關懷。

就在這一連串反移民的事件當下，英國前首相布萊爾 (Tony Blair) 在緘默三年之後，終於在九月一日出版其回憶錄《一段旅程》(A Journey)。跟一般人的預料一樣，回憶錄極力為美、英聯軍於二〇〇三年入侵伊拉克辯護。他表示深為英軍的傷亡感到哀痛，不過他有理由「不後悔出兵的決定」(Blair 2010: 372)，因此他不會為入侵伊拉克道歉，他堅信當時的伊拉克總統海珊 (Saddam Hussein) 仍然有意發展大規模的毀滅性武器。只是他沒想到緊接入侵伊拉克之後所出現的夢魘，特別是蓋達組織與伊朗坐大。可以想見，這本期待已久的回憶錄出版之後，立即引起排山倒海的評論。¹

說來巧合，就在《一段旅程》出版的前一天，美國總統歐巴馬 (Barack Obama) 在其白宮辦公室發表電視談話，宣布美軍終止在伊拉克的軍事行動，並自伊拉克撤軍，只留下五萬多維和與訓練伊拉克軍警的人員。主導入侵伊拉克的美國總統布希 (George W. Bush) 曾經在二〇〇三年五月宣布美軍的「任務完成」，七年多之後，歐巴馬在美軍正式撤出伊拉克時只能低調表示，「一場要裁減一國軍備的戰爭變成了一場制止暴動的戰鬥。恐怖主義與教派衝突即將撕裂伊拉克。我們的對外關係緊張。我們的內部團結也受到挑戰」(引自 Hamilton 2010)。歐巴馬對伊拉克戰爭的低調——其實是不堪和負面評價——與布萊爾的高調辯護形成對比。不論如何強辯，布萊爾的說辭大概只能留下一份屬於他個人的紀錄，許多事實已經無法改變一般人對伊拉克戰爭的看法。這一場費時七年又一百六十五天的戰爭，除了處決海珊並摧毀其政權外，許多冷酷的事實說明，歷史不可能會仁慈

¹ 一九九七年五月一日英國舉行大選，剛好我在倫敦，目睹執政十八年，顛覆而醜聞不斷的保守黨政府終於下台，新工黨以壓倒性的勝利重新執政，年紀不滿五十的布萊爾接任首相，意氣風發，老邁的英國一時煥然一新，朝氣蓬勃，連老舊的英國航空公司都在機尾換上了相當後現代的圖案，有的英國朋友說似乎看到一個新的耶路撒冷的到來。十三年後，英國非但債台高築，新工黨政府因為參與伊拉克與阿富汗戰爭而在國際上樹敵，在國內也日漸失去人民的支持，終於在今年五月的大選後黯然下台。布萊爾也從一位曾經深得民心的首相，在位十年後被迫辭職。連在倫敦泰德現代美術館 (Tate Modern) 所舉行的《一段旅程》新書發表會，也因反戰人士的抗議被迫取消，落得顏面無光。

對待布希與布萊爾。這場實力懸殊的戰爭共耗費近一兆美元，美軍動員超過一百萬人次，死亡四千四百十五人（還不包括英軍的一千餘人，遠超過九一一恐怖攻擊的死亡人數），伊拉克平民死亡者據估計超過十萬人，許多人家破人亡，流離失所，淪為難民者不下五百萬人，其中半數流落在鄰近國家，另外半數則散落在伊拉克國內各地。² 伊拉克二〇一〇年三月間舉行大選，由於沒有任何政黨獲得半數以上的席位，幾經困難才組成聯合政府。什葉派、遜尼派及庫德族人各有所圖，互不相讓，自殺炸彈攻擊更是時有所聞，國家陷入內戰邊緣。雖然目前經濟成長約為百分之五，失業率卻高達百分之四十。這就是美、英聯軍佔領伊拉克七年來留下的結果（*Independent*, 20 August 2010, 4-5）。海珊再壞，也沒有這樣的紀錄，歷史要如何善待布希和布萊爾？

從反移民潮到伊拉克戰爭，這兩者有何關係？這些事件動機不同，動員的規模也不一樣，表面上確實很難同日而語。不過稍加細想，兩者卻有一點倒是共通的，兩者面對的都是他者。就戰爭而言，卡普辛斯基的話很值得我們推敲。他說：「我們很難為戰爭自圓其說；我想每個人都是戰敗者，因為這是對人的挫敗。戰爭暴露了人沒有能力與他者妥協，同情他者，對他者仁慈與理性，因為在戰爭的情況下，面對他者的結果總是悲劇，總是流血與死亡」（Kapuściński 2008: 82）。如果他者是自我的一面鏡子，我們在伊拉克人民的遭遇看到的，是西方某些強權蠻橫自私的一面。顯然，在後殖民與後冷戰時代，其帝國本質仍然沒有多少改變。布萊爾說沒有預期入侵伊拉克後所出現的夢魘，其實跟某些反移民者的內心沒有兩樣，都是因為傲慢，對他者的文化漫不經心，缺少耐心與興趣。布萊爾可以對一千多位死傷英軍與其家屬致歉，並且把《一段旅程》的預付金與日後的版稅全數捐贈皇家英國軍團協會，以幫助傷亡軍人家屬，可是對千千萬萬死傷的伊拉克

² 順便一提，當代日本思想家子安宣邦在《國家與祭祀》一書的〈後記〉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所參與的戰爭都缺乏正當性，因此與國家的光榮扯不上關係。他問說：「為什麼美國在中東之地進行了海灣戰爭這場使用最新兵器的實驗性戰爭？為什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軍隊實施了空襲？——此類即使追問也得不到答案的戰爭，在南斯拉夫，在巴勒斯坦，在阿富汗，而且在伊拉克反覆進行着。……現在進行的戰爭已經完全沒有與國民的榮光相聯繫的戰爭。毋寧說是國民不理解、甚至可以說是國民恥辱的戰爭。這場戰爭沒有勝利，僅有給國民的心靈帶來裂紋和空洞的愚蠢的終結」（子安宣邦 2007: 180）。

人卻只有遺憾，並無一絲愧疚，也無一語道歉。

入侵伊拉克（包括後來美軍的虐囚事件），乃至於晚近的反移民潮，透露了有些人在面對他者時所仰賴的生物政治（*biopolitics*）——否定他者，圍堵他者，羞辱他者，驅逐他者，甚至終結他者的生命。反諷的是，這樣的生物政治卻是為了創造自己的生存條件——消除他者即是消除對自己生存的威脅。所有的修辭包裝在層層剝開之後，最後只剩下自私的、原始的生存慾望。只是慾望是真的，威脅並不一定。前面曾經說過，他者有時候只是代罪羔羊。巴特勒（*Judith Butler*）晚近多次論證，生命何等脆危（*precarious*）。³ 從反移民潮，從伊拉克戰爭看來，有些人的生命要比另一些人的更為脆危。用巴特勒的話說，他們生命的脆危性（*precariousness*）出現「不平等的分配」（*Butler 2009: 22*），因為他們失去了生命存續的政治與社會條件——主流社會、國家機器或國際強權無不處心積慮想要摧毀這些條件。巴特勒以眾生平等的立場，提出「可活的生命」（*livable life*）的觀念，不過她也了解，這個觀念可能會被有些人利用，「作為區分值得存活的生命與可被摧毀的生命的基礎——這也正是為支持某個戰爭而努力的理由，辨識一方面是具有價值的、值得讓人悲傷的生命，另一方面則是不值得一顧的、無須為之悲傷的生命」（*Butler 2009: 22*）。不幸的是，這正是伊拉克戰爭與晚近一連串反移民事件的認識論基礎。這也是有些人排斥異文化的深層理由。

在《消解性別》（*Undoing Gender*）一書的最後一章，巴特勒主要以自身的治學經驗，見證哲學在哲學學門以外開枝散葉的情形，她將寄居在別的學術領域的哲學學者稱之為哲學的「他者」，而且提出一個相當史碧娃克式（*Spivakian*）的問題：「哲學的『他者』能否發言？」她提到早年自己處理黑格爾哲學中慾望與承認的問題時指出：「慾望一方面想否定他者的他者性（即：因為他者的結構和我的相似，佔據了我的地盤，威脅了我的單一存在），另一方面則又處於這樣一個困境：它需要那個他者，又害怕自己成為那個他者，被那個他者所攫取」

³ 我知道中文有「垂危」一詞，隱含「危在旦夕」的意思，似不足以翻譯“*precarious*”一字，故暫譯為「脆危」，表示脆弱與危險。

(Butler 2004: 240)。⁴ 慾望與承認界定了自我與他者的關係，自我雖然在他者身上看到自己，卻又深感受到威脅，因此必須否定他者——否定的形式與方法很多，從反移民到入侵伊拉克，我們看到程度不同的否定。為抵拒對他者的否定，巴特勒也因此提到承認的重要性。從泰勒(Charles Taylor)闡述承認的政治開始，過去二、三十年，承認的議題在英、美學界的討論已經很多(參考Taylor and Gutman 1994, Honneth 1996, Markell 2003 等)，巴特勒則把這個議題進一步帶到另一個面向，要我們承認生命脆危，承認對他者的義務或責任。她延續在《消解性別》一書中對承認的論證指出：

譬如，說生命會受傷，會消逝，會被摧毀，或者系統性地被忽略以致於死亡，不僅是在強調生命有限(死亡無可避免)，也是在強調生命脆危(生命因此需要諸多社會與經濟條件以便能以生命存續)。脆危性暗示生命存在於社會中，暗示一個人的生命在某個意義上總是掌握在別人的手上。脆危性也暗示生命對我們認識與不認識的人暴露；暗示生命對我們所認識，或略微認識，或根本不認識的人的依賴。相對地，對別人(大部分身分不明)的暴露與依賴也暗示了生命會受到侵害。這一切不一定出於愛甚至關懷的關係，但卻構成對他人的義務，這些他人大部分我們都叫不出名字，也不認識，對意義上確定的「我們」是誰而言，他們也許有也許沒有熟悉的特徵。換成一般的說法，我們可以說對「他人」具有義務，同時假設在這個情況下，我們知道「我們」是誰。(Butler 2009: 13-14)

二

這本書以論證他者的歷史重要性開始，接着分析影像文化與文學所透露的對他者的排拒、恐懼與迫害。其餘的章節則析論與他者身分密切相關的若干議題，包括後現代戰爭、全球化、跨文化論等。第一章〈外邦女子路得〉重新詮釋《舊

⁴ 譯文參考郭劼的譯本(朱迪斯·巴特勒 2009: 245)，為行文方便，曾略作修飾。

約·路得記》(*Ruth*)，主要有感於我們的社會對外籍配偶的歧視。這種歧視非僅存在於一般社會與文化之中，也存在於建制性的立法當中。這一章嘗試以嫁入以色列的摩押(Moab)女子路得為例，論證以待客之道悅納他者的重要性。路得以外邦女子的身分，嫁以色列人為妻，成為以色列人的母親，竟影響了往後以色列的歷史與王權系譜的傳承，以及猶太教與基督教的分合發展。如何悅納外邦人因此有時具有關鍵性的意義。

第二章〈冷戰與政治他者〉主要在反省與批判一九五〇年代美國的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麥卡錫主義是冷戰初期美國政治右翼賴以迫害政治他者的意識形態利器，影藝界廣受株連。冷戰對人類社會所造成的創傷難以衡量，極權世界固然以反右、反資本主義之名鬥爭無數政治與意識形態上的非我族類，自由世界其實也不遑多讓，基於反左、反社會主義的立場，多少政治與思想上的異議分子在白色恐怖下蒙冤受屈，甚至家破人亡。麥卡錫主義的時代雖然已經過去，但是麥卡錫主義仍然盤據在某些人內心見不到陽光的角落，隨時會被召喚，像幽靈那樣不願離去。所有貼標籤、扣帽子之類的政治與文化的獵巫行為只是麥卡錫主義的有形縮影，反映的是社會上某些人的思想怠惰與心靈閉塞。

第三章則以科幻電影《異形》(*Alien*)為例，探討在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下他者的命運，影片中的異形在某種意義上具現了資本帝國對第三世界他者的覬覦與恐懼。異形本為無名星球的原住民，資本帝國對無名星球的侵犯與掠奪引起異形的激烈反擊，最後造成兩敗俱傷。這部影片顯然在寓意上有意批判資本帝國的貪婪與無窮慾望，伴隨着貪婪與慾望的則是對他者的焦慮與不安。

第四章的〈帝國創傷〉則嘗試藉巴特勒(Judith Butler)、卡柏蘭(E. Ann Kaplan)及卡露絲(Cathy Caruth)等所發展的創傷與傷悼概念，析論莫欣·哈密(Mohsin Hamid)的後九一一小說《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中所隱含的政治寓意。這一章旨在檢討與勾勒美國的帝國本質，批判美國如何挾其軍事與經濟的強大力量，以資本帝國的暴力為第三世界他者帶來苦難與悲劇。可惜美國久因強權而倨傲，早已失去謙卑自省的能力。美國無法

了解：九一一恐怖攻擊帶給美國的創傷，其實與美國過去數十年帶給第三世界他者的創傷是分不開的。

從第五章開始，議題轉到與他者身分相關的若干文化問題。第五章緊接着第四章的討論，分析後現代戰爭的虛擬性與電動遊戲化。這樣的戰爭最後所呈現的是場面多於資訊、擬像多於真實、擬像多於指涉，在戰爭中死傷的平民百姓竟彷彿淪為隱形的他者，再現也因此成為問題，最後恐怕必須歸結到後現代社會中資訊製作與知識生產的根本問題。

第六章〈全球在地化〉延續第五章的議題，討論在地他者的文化如何面對與因應全球文化資本主義的挑戰與衝擊。這一章以夾敘夾議的方式論證文化帝國主義可能造成的文化同質化的危機，不過在論證的過程中我也注意到在地文化可能的抗拒與修正。在這種情況之下，文化帝國主義也會調整本身的策略與內容，設法消解在地文化的抗拒與對立。

最後一章則把上一章的討論推向跨國文化研究的問題。在文化消費主義的推波助瀾之下，許多在地的文化資本都有意開發跨國或跨文化的面向，因此導致在爭奪文化產品的意義時全球與在地之間的緊張狀態。這是自我與他者之間必須共同面對的問題。這一章以性質與形貌相異的兩個文化文本——李安的《臥虎藏龍》與非裔美國人的饒舌音樂——析論跨文化轉向如何改變與改造文化生產。在全球流動的脈絡下，我們顯然迫切需要活潑開放的描述文化的新視野與新方法。

這本書所處理的文化文本與事證也說明了，這些議題雖然古老，但卻並不過時，從《聖經》的故事到今天仍在我們身邊不時發生的事件可以看出，他者與其相關的文化議題始終盤據着我們的文化想像。美國佛羅里達州一個小鎮教會——會眾不滿五十人——的牧師準備在九一一事件十週年紀念那天發動焚燒《古蘭經》的行為引起全球軒然大波，一方面固然證明了這個世界仍有很多對他者與他者的文化愚昧無知的人，他們心懷恐懼，不知如何自處，也不知如何面對他者，只能忙於製造仇恨，妄想以焚書之類的象徵性動作阻絕或摧毀他者的文化，作為對他者的懲罰。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全球文化流動既快速而又無遠弗屆，跨文化的

了解與研究確實有其重要性。

面對他者，了解他者，承認他者，甚至悅納他者，視他者為自我的映照，在一個仍然充滿偏見、愚昧、仇恨的世界裏，這不僅是學術問題，也是倫理責任的問題。